

印度参与“印太”机制建设的行为特点 及战略目标^[1]

戴永红 解斐斐

【内容提要】2018年莫迪“香格里拉讲话”后，印度加大了对所谓“印太”机制的参与力度。在制度上，印度逐步完善具有印度特色的“印太”政策架构，打造以印度为核心的“印太”机制框架。在实践上，印度深化与“印太”关键国家的合作，推动提升“印太”机制的制度水平。其间，印度不断拓展参与范围，将“印太”机制下的合作扩展至安全、经济及其他领域。印度参与“印太”机制的进展与成效虽各不相同，但始终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在安全上，以应对“地区安全局势变化”为由拓展自身安全利益；在政治上，巩固其新兴大国地位，扩展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在经济上，深度融入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总体来看，印度对“印太”机制的参与前景受制于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战略自主”传统的局限性以及印度国家实力的有限性等一系列因素，其未来成效有待持续观察。

【关键词】印度外交 印太海洋倡议 四方安全对话 战略自主 中印关系

【作者简介】戴永红，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深圳大学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院教授；解斐斐，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6) 03-0155-27

[1] 本文系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环孟加拉湾地区局势对我“东数西算”工程的安全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2ZDA18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自2016年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以来,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以及东盟、欧盟官方纷纷采用“印太”一词,并相继推出以促进自身战略利益为中心的“印太”战略或倡议。在一些认同所谓“印太”概念的行为体看来,“印太”机制则是“印太”地区国家围绕特定议题逐渐缔结或构建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体系。^[1]“印太”机制的形成、发展与地区国家的推动密切相关,这些国家的重点关注与大力推动使得“印太”机制成为大国参与“印太”事务、推进地区战略的重要抓手。

印度自认为是“印太”地区的重要行为体,近年来积极参与所谓“印太”机制,以期拓展自身战略利益和地区影响力。2018年6月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印度总理莫迪首次明确阐述印方有关“印太”的立场,强调印度作为“印太”主要参与者,最终目标是实现“印太”愿景,建立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基于规则的印太秩序”。^[2]此后,印度加大了对“印太”机制的参与力度。然而,印方所认为的“印太”地区并未发展出一种统一机制,而是各种新老机制相互交织,发展程度不一,功能各异。印度对这些机制的参与度、参与面、主要目标各不相同,其前景也迥异,且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本文尝试梳理印度参与所谓“印太”机制的具体进展,分析印度参与相关机制建设的行为特点、战略目标以及面临的制约因素,为学界和实务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本文主要讨论印度对所谓“印太”机制的参与,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印度强调的“印太”与美国使用的“印太”概念有所区别,其对抗性色彩要更弱一些。二是印度重点参与的“印太”机制主要有三大类:印度主导的“印太”机制、美国主导的“印太”机制以及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印太”机制是国际机制的一种类型,有关国际机制的解释可参见秦亚青:《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载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101页;[美]罗伯特·基欧汉、[美]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2]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 June 1, 2018,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018>.

一、印度参与“印太”机制建设的行为特点

印度对“印太”机制的态度经历了从怀疑到肯定、从谨慎到积极的变化过程。在国际局势变化以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印度参与所谓“印太”机制的主动性逐步增强,参与深度和力度日益加大,在主导制度设计、深化参与程度、扩大参与范围等方面形成了一些鲜明特点。

(一) 完善印度特色的“印太”政策架构,打造以印度为核心的“印太海洋倡议”机制

冷战结束后,印度调整其对外战略,通过“东向政策”(LEP)逐步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政治、安全联系,并扩大了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其他亚太国家的交往。在此过程中,印度开始推动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湄公河—恒河合作(MGC)等机制的建立和发展,并积极参与东盟主导的相关机制。2014年11月,印度莫迪政府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进政策”(AEP),试图借助“印太”这一地缘框架积极向东布局,强化印度的经济与安全存在,平衡中国影响力。印度对地区事务的参与程度日益加深,其核心战略利益跨越印度洋,在太平洋地区进一步扩展。

事实上,印度官方早在2012年就开始使用“印太”概念。2014年莫迪上台后,印度政府对“印太”的重视程度大幅提升,并逐步将“印太”概念运用于制度设计层面,力图打造以印度为核心的“印太”机制框架。印度官方并未像美国、日本、欧盟、东盟等那样发布专门的“印太”战略文件,但也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有关“印太”的政策宣示和举措,并积极完善国内制度架构,逐步构建起从宏观到微观且具有印度特色的“印太”地区政策框架。这成为印度深度参与所谓“印太”机制的制度基础。

2015年3月莫迪在访问毛里求斯期间提出“萨迦”愿景(SAGAR)。“萨迦”愿景重点关注海洋尤其是海洋安全,强调印度要与地区伙伴合作来维

护自身海洋安全与经济利益,并提出印度参与地区海洋合作的基础目标和基本规则。^[1]2018年6月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莫迪对“印太”概念及其地理范畴进行界定,并明确提出具有印度特色的“印太”愿景。这为印度参与所谓“印太”事务提供了基本纲领和战略框架,同时使印度能够聚焦“包容性”“东盟中心地位”“地区繁荣”等特定政治内涵。^[2]2019年4月,印度外交部设立“印太”司,旨在将东亚峰会、环印度洋联盟、湄公河—恒河合作等地区 and 次区域机制事务纳入统一的“印太”框架之下。“印太”司专门负责规划“印太”愿景、统一认知、推动各项相关政策落地实施。同年11月,印度政府又在东亚峰会上发起“印太海洋倡议”(IPOI,以下简称“倡议”),以期为印度推进“印太”地区政策提供具体行动方案。2025年3月,莫迪再次访问毛里求斯时将“萨迦”愿景升级为“马哈萨迦”愿景(MAHASAGAR),试图拓展地区安全与经济合作,提升印度在全球海洋领域的影响力。^[3]从“萨迦”愿景到“马哈萨迦”愿景,从“印太”愿景到“印太海洋倡议”,这一系列政策举措既加强了印度政府关于“印太”制度的顶层设计,充实了其“印太”战略框架,也为其深度参与所谓“印太”机制建设夯实了政策基础。

发起和推动“印太海洋倡议”是印度力图强化在“印太”机制建设中关键地位和引领作用的重要举措。作为一项开放性的、不以条约为基础的

[1] “萨迦”在印地语中意为“海洋”,是地区同安共荣的简称。参见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Prime Minister’s Remarks at the Commissioning of Offshore Patrol Vessel (OPV) Barracuda in Mauritius,” March 12, 2015,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4912/Prime_Ministers_Remarks_at_the_Commissioning_of_Offshore_Patrol_Vessel_OPV_Barracuda_in_Mauritius_March_12_2015。

[2]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 June 1, 2018,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018>。

[3] “马哈萨迦”在印地语中意为“大洋”,全称为“相互且全面地促进跨地区同安共荣”。参见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Prime Minister Shri Narendra Modi Announced Vision MAHASAGAR – ‘Mutual and Holistic Advancement for Security and Growth Across Regions’ for the Global South in Mauritius,” March 12, 2025, <https://www.mea.gov.in/newsdetail1.htm?13355/>。

地区安排，“倡议”明面上提出的宗旨是，依托现有地区架构和机制加强与“印太志同道合”国家的多边合作、增强地区韧性、打造议题导向型的海洋伙伴关系，应对“印太”海洋领域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强化印度作为“印太”地区“净安全提供者”和“议程制定者”的作用，用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的话讲，就是“轻架构、重合作”。^[1]“倡议”明确规定了印度海洋合作的“七大支柱”：“海洋安全”“海洋生态”“海洋资源”“能力建设与资源共享”“减灾与灾害风险管理”“科学、技术与学术合作”“贸易联通与海洋运输”，七者可谓密切关联、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印太”海洋合作网络。

随后，印度外交部迅速向澳大利亚、印度、越南等国转交了一份全面说明，征求相关伙伴国的意见，希望加快推进“倡议”。为引领该机制发展，印度重点完善“七大支柱”牵头国制度，包括：伙伴国加入“倡议”后可根据自身发展特点与技术专长围绕“七大支柱”展开合作，并担任特定支柱的牵头国；每个支柱都由一到两个牵头国负责，其他国家可自愿参与。印度宣称，牵头国制度赋予“七大支柱”透明度和包容性，有助于呼应参与国关切，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为积极推动地区“志同道合”的国家参与其中，印度首先邀请澳大利亚、印尼和越南担任相关“支柱”的牵头国。经过近几年的推进，“倡议”已形成了较为成形的“七大支柱”牵头国制度。其中，“海洋安全”支柱的牵头国为英国和印度，“海洋生态”的为澳大利亚和泰国，“海洋资源”的为法国和印尼，“能力建设与资源共享”的为德国、荷兰和欧盟，“减灾与灾害风险管理”的为印度和孟加拉国，“科学、技术与学术合作”的为意大利和新加坡，“贸易联通与海洋运输”的为日本、印度和美国。截至2026年5月，除上述牵头国外，希腊、新西兰、西班牙、

[1] Australian High Commission in India, “High Commissioner’s Keynote Address at the Indo-Pacific Oceans Initiative (IPOI) Conference,” October 6, 2022, <https://india.highcommission.gov.au/ndli/HOMspeechIPOI06102022.html>;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Prime Minister’s Speech at the East Asia Summit,” November 4, 2019,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2171/Prime_Ministers_Speech_at_the_East_Asia_Summit_04_November_2019.

韩国、越南、挪威、塞浦路斯7国也正式加入“倡议”。

（二）深化与“印太”关键国家的合作，推动提升所谓“印太”机制的制度化水平

近年来，印度注重通过深化与地区“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特别是大幅提升与关键国家的伙伴关系，深度参与所谓“印太”机制建设，使得相关机制的制度化水平逐渐提升。

一是加强与“印太”伙伴国的合作，努力拓宽印度主导的“印太”机制的合作渠道。对于其占据主导地位的“印太海洋倡议”，印度通过“七大支柱”牵头国制度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等国的合作，推动“倡议”的具体实施。其中，印澳两国在“澳印印太海洋倡议伙伴关系”（AIPOIP）下的合作就颇具代表性。2020年6月，印澳两国领导人共同发表《印澳关于“印太”海洋合作共同愿景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澳印印太海洋倡议伙伴关系”，并将此作为“倡议”的旗舰项目来推动“倡议”真正起步。“澳印印太海洋倡议伙伴关系”致力于为“倡议”的未来发展规划具体方案，并设立种子基金，支持印澳两国相关机构推进海洋合作项目。该伙伴关系支持澳在“海洋生态”支柱中扮演领导性角色，重点关注印澳两国及其他“印太”伙伴在海洋垃圾处理、海洋生态保护等领域的务实合作。^[1]两国研究机构在2022—2023年发起“印太地区海洋管理与海洋安全一体化”的合作项目，并在“倡议”框架下成立海洋与海岸恢复中心，通过聚焦“七大支柱”、气候变化、海洋塑料垃圾处理等具体议题推动两国海洋合作项目的落地实施。

二是深化与美日澳之间的战略协调，助推美国主导的所谓“印太”机制的制度化。参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2]是印度参与所谓“印

[1] Australian High Commission in India, “Australia-India Indo-Pacific Oceans Initiative Partnership: Grant Round 1,” <https://india.highcommission.gov.au/ndli/AIPOIP.html>; “Australia-India Indo-Pacific Oceans Initiative Partnership: Grant Round 2,” <https://india.highcommission.gov.au/ndli/AIPOIP1.html#:~:text=About%20the%20program,and%20rules%2Dbased%20maritime%20order>.

[2] 该机制最早可追溯至2004年美日印澳四国成立的“海啸核心小组”。2007年Quad举行首次非正式会议和海上联合演习之后悄然解散，直至2017年11月东盟峰会期间宣布重启。

太”机制的一大重点，印度经历了从谨慎到积极参与的态度变化。2017年该机制重启后，印度明显不如美日积极，主要体现在限制印方参与该机制会议的人员规格与规模、谨慎表态以及严格限定四国安全合作范围等方面。^[1]但随着“制衡中国”的战略需要上升以及四国互动程度逐渐加深，印度开始将美国视为“不可或缺”乃至“最为重要”的战略伙伴，将日本和澳大利亚视为“印太”地区的“天然伙伴”^[2]，日益深化与美日澳之间的战略协调，与三国之间均形成了以“2+2 部长级对话”为核心的高级别合作交流机制，并与三国签定了一系列防务合作协定。^[3]这为印度深度参与 Quad 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印度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近年 Quad 发展明显加快，机制平台下合作日益深化，制度化水平显著提升，形成了以领导人峰会、部长会议、高级官员会议为核心的多层级协调合作框架。一方面，Quad 从最初的四国高级官员工作会议升级为部长级会议并逐渐常态化。Quad 外交部长会议首次于 2019 年 9 月召开以来，迄今已开过 11 次。2026 年 5 月，Quad 外长会议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关注“印太”地区的海洋安全与跨国安全、经济繁荣与安全、关键与新兴技术、人道主义援助与应急响应等议题，并宣布启动“印太海洋监视合作”（IPMSC）倡议、“Quad 印太能源安全

[1]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Australia–Japan–U.S. Consultations on Indo–Pacific,” November 12, 2017, https://www.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29110/IndiaAustraliaJapanUS_Consultations_on_IndoPacific_November_12_2017; Patrick Gerard Buchan, Benjamin Rimland, “Defining the Diamon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rch 16, 2020, pp.2–3,11–13.

[2] Sujan R. Chinoy, “India and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the Indo–Pacific,” *Asia Policy*, Vol.15, No.4, October 2020, pp.29–30; Darshana M. Baruah, “India in the Indo–Pacific: New Delhi’s Theater of Opportunity,” *Working Pape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ne 30, 2020, p.13.

[3] 近十年达成的防务合作协定主要包括印美签署的《后勤交换备忘录协定》（2016）、《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2018）、《地理空间情报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2020）三大基础性防务合作协定以及十年期《美印主要防务伙伴关系框架协议》（2025），印日签署的《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议》（2020）和印澳签署的《后勤相互支援协议》（2020）等。

倡议”，更新“Quad 关键矿产倡议框架”。^[1] 除外长会议之外，Quad 还相继举行能源部长会议和商务与工业部长会议，并在 2024 年 10 月举行 Quad 开发性金融机构（DFI）领导人会议，以期加强四国在经贸、投资、能源等领域的协调与配合。

另一方面，Quad 还启动了最高层级的领导人峰会，为四国合作设定更加清晰的议程。该峰会于 2021 年 3 月首次召开，迄今已开过 6 次。峰会形式灵活，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主要聚焦非传统安全议题，并日益关注海域态势感知等“印太”海洋安全问题。在 Quad 峰会框架下，印度与美日澳开展政策协调，拓展共同议程，协同效应显著增强。首次峰会后，四国发布首份题为《Quad 精神》的联合声明，宣称四国不仅有着共同的“印太”愿景，而且还要加强 Quad 框架下的合作，应对当前“重大挑战”，并强调所谓“自由、法治、民主价值观、航行与飞越自由”等基本原则“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2] 这表明印度的“印太”立场向美日澳三国大幅靠拢。在此基础上，Quad 峰会围绕具体议题成立一系列工作组，并发起多项倡议与合作项目，如关键与新兴技术工作组、基础设施协调小组、网络安全伙伴关系、“印太”地区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伙伴关系等。

此外，印度也加入了 2022 年 5 月美国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成为其首批 13 个初始成员国之一。2023—2024 年，印度相继签署该机制框架下的《供应链韧性协议》（第二支柱）、《清洁经济协议》（第三支柱）和《公平经济协议》（第四支柱），并担任供应链理事会（SCC）副主席。

三是推动印度与东盟两大“印太”倡议的深度融合，积极参与东盟主导的海洋安全合作机制。1995 年，东盟与印度建立全面对话伙伴关系；1996 年，印度获准加入东盟地区论坛；2002 年，双方建立起东盟—印度领

[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6 Quad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in New Delhi,” May 26, 2026, <https://www.state.gov/releases/office-of-the-spokesperson/2026/05/2026-quad-foreign-ministers-meeting-in-new-delhi/>.

[2]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Quad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The Spirit of the Quad’,” March 12, 2021, 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3620/Quad_Leaders_Joint_Statement_The_Spirit_of_the_Quad.

领导人峰会机制；2010年，印度和中、美、俄、日等其他7个东盟对话伙伴国与东盟共同开启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2012年，印度与东盟关系升格为战略伙伴关系，各领域特别是政治、安全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

近年来，印度视印尼、新加坡、越南等国为印度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的重要伙伴，着力加强与这些东盟关键国家的合作。2019年6月东盟推出“东盟印太展望”（AOIP，以下简称“展望”），强调要依托东盟主导的原有地区机制（如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主动塑造具有包容性的“印太”经济与安全架构，防止该地区沦为大国博弈的竞技场。^[1]与此同时，印度认为东盟在“印太”海域发挥着核心作用，强调东盟的“展望”与印度的“印太海洋倡议”之间具有协同性^[2]，表示要将“倡议”与“展望”深度融合，并将这一融合作为印度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的政策框架。2020年9月，印度与东盟发布《关于落实和平、进步与共同繁荣的东盟—印度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2021—2025）》，将“展望”作为发展印度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指导原则，强调双方主要通过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开展海洋合作及其他方面的务实合作，并适时推进“展望”与“倡议”在原则、目标、基本要素等方面的对接。^[3]2021年10月，双方发布《东盟—印度关于就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东盟印太展望”开展合作的联合声明》，强调印度与东盟要通过发掘两大倡议之间的合作潜力来深化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重点关注“展望”框架下的四大优先合作领域，即海洋合作、互联互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经济及其他潜在

[1]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Overview: ASEAN-Ind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January 2026,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6/01/cl-Overview-ASEAN-India-ao-Jan-2026.pdf>.

[2]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Prime Minister’s Speech at the East Asia Summit,” November 4, 2019,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2171/Prime_Ministers_Speech_at_the_East_Asia_Summit_04_November_2019.

[3]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Plan of Action to Implement the ASEAN-India Partnership for Peace, Progress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21-2025)*, September 12, 2020, pp.1,3,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3/11.-ASEAN-India-POA-2021-2025-Final.pdf>.

合作。^[1]2022年,双方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5年7月,正式通过《关于落实东盟—印度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2026—2030)》,强调双方要依托“展望”四大优先合作领域下的专门工作组推动具体项目落地实施,进一步促进双方围绕“展望”开展深入合作。^[2]

印度和东盟政治关系不断拉近,为双方海洋安全合作走向机制化进一步提供了“契机”;而“深化海洋领域合作、推动可持续的海洋治理”是印度与东盟的一项共同承诺。^[3]2023年5月,印尼、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等7个东盟成员国与印度在南海举行首届东盟—印度海上演习(AIME—2023),以增强双方海军的协同能力。同年9月第20届东盟—印度峰会期间,双方发布《东盟—印度海洋合作联合声明》,强调海洋是推动“印太”地区发展与繁荣的关键因素,印度与东盟重点关注海上信任设施建设、海洋信息共享、海洋非传统安全等议题,致力于将双方海洋安全合作提升至最高水平。^[4]2025年10月东盟—印度峰会期间,双方宣布将2026年设立为“东盟—印度海洋合作年”,以深化印度与东盟之间的“印太”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双方在海洋安全、蓝色经济、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等领域的合作。在“东盟—印度海洋合作年”框架下,双方将于2026年9月底举行第

[1]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India Joint Statement on Cooperation on the 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for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Region*, October 28, 2021,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1/10/71.-ASEAN-India-Joint-Statement-on-Cooperation-on-the-ASEAN-Outlook-on-the-Indo-Pacific-for-Peace-Stability-and-Prosperity-in-the-Region-Final.pdf>.

[2]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Plan of Action to Implement the ASEAN-Ind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2026-2030)*, March 2026,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6/03/Final-POA-to-Implement-ASEAN-India-CSP-2026-2030-adopted.pdf>, p.17.

[3]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and India Reinforc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Priorities,” February 13, 2026, <https://asean.org/the-26th-meeting-of-asean-india-joint-cooperation-committee-convenes-at-asean-headquarters-asean-secretariat/>.

[4]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India Joint Statement on Maritime Cooperation*, September 7, 2023,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3/09/ASEAN-India-Joint-Statement-on-Maritime-Cooperation-FIN-1.pdf>.

2 届东盟—印度海上演习，并且印度还计划主办第 7 届东亚峰会海洋安全合作会议、东亚峰会海洋遗产节等活动。^[1]

（三）安全与经济相结合，大幅拓展印度参与所谓“印太”机制的合作领域

近年来，印度参与所谓“印太”机制合作的范围日益扩大，从非传统安全逐步扩展至传统安全、经济及其他领域。在安全领域，印度最初参与 Quad 时严格限制四国合作范围，将其限定在反恐、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等敏感度较低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并一度反对与美日澳一起建立 Quad 海军演习框架，多次拒绝澳大利亚加入印美“马拉巴尔”海军演习（日本于 2015 年加入）的请求。印度战略精英更是对成立“Quad 常务秘书处”“Quad 常设军事特遣部队”等推动该机制制度化的硬性举措持消极态度，担心这会导致 Quad 发展成公开的反华同盟。^[2]

2020 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参与 Quad 安全合作的范围大幅拓展，从非传统安全逐步扩展至传统安全领域。2020 年 11 月，印度邀请澳大利亚加入“马拉巴尔”海军演习，意图利用 Quad 的“集体军事力量展示”来对冲中国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压力”。^[3]2021 年 3 月首次 Quad 峰会后，四国成立一系列高级别工作组，并发起各种议题导向型的安全合作倡议，试图拉拢地区中小国家，依托 Quad 强化四国在海洋安全、能源安全、供应链安全等领域的整体布局，进而构建排他性的地区安全合作网络。其中，以海域态势

[1]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22nd ASEAN–India Summit,” October 26, 2025, <https://asean.org/chairmans-statement-of-the-22nd-asean-india-summit/>.

[2] Vinay Kaura, “Incorporating Indo–Pacific and the Quadrilateral into India’s Strategic Outlook,” *Maritime Affairs*, Vol.15, Iss.2, January 2020, pp.8,15; Patrick Gerard Buchan, Benjamin Rimland, “Defining the Diamon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rch 16, 2020, pp.2–3, 11–13, 19.

[3] Abhijnan Rej, “In ‘Historic’ Summit Quad Commits to Meeting Key Indo–Pacific Challenges,” *The Diplomat*, March 13, 2021,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3/in-historic-summit-quad-commits-to-meeting-key-indo-pacific-challenges/>.

感知为核心的海洋安全合作是印度深度参与 Quad 安全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2022 年 5 月, 四国领导人在 Quad 东京峰会上发起“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 倡议, 旨在推动四国与地区国家及机构开展合作, 增强信息共享与海上监控能力, 并通过开展所谓“海上执法行动”来提升地区海域态势感知能力, 构建“印太”海洋安全情报监控网络。四国还基于 IPMDA 发起“印太海洋培训倡议”(MAITRI)、“Quad 船上观察员任务”等项目, 以“加强行动协同, 促进知识共享, 推动印太伙伴国的海洋安全能力建设”。2026 年 5 月, 四国在 Quad 外长会议上发起“印太海洋监视合作”倡议, 作为对 IPMDA 的强化和补充。“印太海洋监视合作”倡议试图整合四国在“印太”地区的海上监视能力, 支持印度通过印度洋地区信息融合中心(IFC-IOR) 落实 IPMDA 的印度洋地区项目。除上述印度洋地区专项试点项目, 四国还计划通过专家交流、桌面推演等方式强化信息共享和海域监控能力, 并计划利用 Quad 伙伴在“印太”海域的共享实时信息生成一套完整的通用行动态势图(COP), 以进一步提升对海上船只的动态监测能力。^[1] 另外, 四国在此次 Quad 外长会议上宣布将由印度主办第二次“Quad 船上观察员任务”。^[2]

与此同时, 印度参与所谓“印太”机制下的经济、技术等合作也明显扩大。在区域层面, 印度主推的“印太海洋倡议”事实上涵盖了蓝色经济发展、港口基础设施联通、海洋贸易网络拓展、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海洋信息与技术共享、海洋生态保护等多个合作领域。在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下, 印度在供应链多元化、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方面得到一定收益, 如 2023 年

[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6 Quad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in New Delhi,” May 26, 2026, <https://www.state.gov/releases/office-of-the-spokesperson/2026/05/2026-quad-foreign-ministers-meeting-in-new-delhi/>.

[2] “Quad 船上观察员任务”项目是美日印澳根据 2024 年 Quad 威尔明顿峰会安排成立的四国海岸警卫队之间登舰互派协作机制, 主要开展海上联合巡逻、执法、搜救等演训活动。第一次任务由美国于 2025 年 6 月底主办, 四国海岸警卫队各派遣 2 名军官登临美海岸警卫队巡逻舰“斯特拉顿”号, 并随舰在帕劳至关岛之间的西太平洋海域展开相关演训活动。参见 India Ministry of Defence, “Quad Nations Launch First-Ever ‘At Sea Observer Mission’ to Boost Maritime Cooperation,” June 30, 2025, <https://www.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2140932®=3&lang=2>。

美光等美国芯片巨头宣布在印投资建厂，亚马逊承诺在 2030 年前将在印投资总额增加到 260 亿美元。^[1]2017 年 5 月印日两国发起“亚非发展走廊”倡议，标榜两国要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促进亚非地区工业网络的发展。^[2]印度还通过湄公河—恒河合作、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等机制来拓展同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与东盟的地区联通旗舰项目印缅泰三边公路项目和印缅卡拉丹多式联运项目就是通过这些机制推动实施的；积极推动 MGC 制度框架的升级与改进，2023 年 7 月 MGC 第 12 次外长会议宣布重启该机制牵头国制度并在机制下成立商业理事会，以进一步促进企业广泛参与到地区经济合作进程中来。

在 Quad 层面，2021 年 9 月美日印澳启动“Quad 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宣称四国要“加强协调合作与技术援助，推动印太地区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开发”；2024 年 9 月发起“Quad 未来港口伙伴关系”，声言要“充分利用四国专业知识和丰富资源来动员公私部门投资，支持印太地区高质量、可持续且富有弹性的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在印度于 2025 年 10 月举办首届“Quad 未来港口伙伴关系”会议后，2026 年 5 月 Quad 外长会议又强调要在该伙伴关系框架下与斐济合作，共同推动斐港口基础设施建设。2025 年 7 月，四国宣布启动“Quad 关键矿产倡议”，声称要“通过合作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与多元化，以增强印太地区的经济安全与集体韧性”；2026 年 5 月 Quad 外长会议对该倡议进行更新，宣布启动“Quad 关键矿产倡议框架”，试图从宏观层面引导 Quad 伙伴利用经济政策工具进行协调投资，进而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相关经济安排实质上是 Quad 成员国重塑地区产供应链架构、构建排他性经济圈层的具体尝试。

[1] “Amazon Raises Investment in India to \$26 Billion by 2030,” CNBC, June 24, 2023, <https://www.cnbc.com/2023/06/24/amazon-commits-to-15-billion-india-investment-ceo-andy-jassy-says.html>.

[2] RIS, ERIA and IDE-JETRO, *Asia Africa Growth Corridor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 Vision Document*, Ahmedabad: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Meeting, May 22–26, 2017, pp.3–4.

二、印度参与“印太”机制建设的主要目标

印度参与的“印太”机制类型多样、功能各异,其所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但有着明确的战略意图,主要有三大目标。

(一) 以应对所谓“地区安全局势变化”为由,拓展自身安全利益

拓展自身安全利益是印度参与所谓“印太”机制建设的首要目标。印度宣称,全球权力重心的转移以及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加速变迁正在动摇国际秩序的基础,这使得当今时代充满不确定性,更导致“印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1]2020年6月,印度在《印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中断言,“印太”地区将来面临的诸多挑战都有可能来自海上,甚至直接发生在海洋领域。因此,随着“印太”地缘政治空间逐渐成形、大国“印太”战略持续推进,作为“印太”地区重要行为体的印度不得不转变思维,积极应对“印太”这一新出现的地区安全环境。^[2]

在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下,印度认为其主要战略目标是应对中国崛起,“防止中国在印太地区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印度周边国家的合作日益密切,地区影响力显著提升。印度认为,中国在“印太地理空间内的拓展正在改变印度的战略环境(尤其是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这种变化威胁到印度“作为印度洋主要大国和地区安全提供者的地位”,并诬指中国“在印太海域的崛起对印度构成安全威胁”。^[3]

[1]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 June 1, 2018,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018>.

[2] 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 *Indo-Pacific Oceans Initiative(IPOI): Towards a Sustainable and Prosperous Indo-Pacific Region*, New Delhi: Sapru House, 2022, p.13.

[3] 参见 Committee on External Affairs (2024-25), *Evaluation of India’s Indian Ocean Strategy*, New Delhi: Lok Sabha Secretariat, August 2025, pp.3, 26-28; Rajesh Rajagopalan, “Evasive Balancing: India’s Unviable Indo-Pacific Strateg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6, Iss.1, January 2020, p.76 等。

首先，印度将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大规模港口基础设施建设视为对印度的“战略包围”和对其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主导地位”的挑战。印度决策者在很大程度上将中国参与建设的印度洋港口设施视为军民两用设施，妄称中国有可能“将这些商业港口升级为永久性军事基地”，“使印度面临的海洋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并断言中国的这些举措与印度的安全利益有着“潜在冲突”。^[1]其次，印度对“中国海军在印度洋拓展军事存在表示忧虑”。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正常活动，如中国海军潜艇和舰船停靠斯里兰卡科伦坡港、访问巴基斯坦卡拉奇港以及在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补给休整等，被印度臆造为“可能对印度的航行自由构成限制”和“需要加强战略筹谋予以应对”。^[2]事实上，上述“中国挑战”或“中国威胁”与其说是印度的所谓“真实感知”，不如说更可能是其建构的叙事话术，目的是为其深度参与并积极推动 Quad、“印太海洋倡议”和其他地区相关机制框架下的海洋安全合作提供“合理性”借口，从而通过推动和参与构建多边性质的所谓“印太”安全合作网络，“平衡中国影响力”，“消解中国在印太海域崛起给印度带来的战略压力”。

（二）巩固印度的新兴大国地位，扩展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

自尼赫鲁以来印度领导人的一大政治目标就是追求“有声有色大国”的地位，提升印度的国际影响力。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印度综合国力的提升，印度总理莫迪赋予这一政治目标新的内涵。他在第一次就任总理不久后的 2015 年 2 月就表示，印度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扮演“领导性角色”，

[1] Abhijit Singh et al., *The New India-US Partnership in the Indo-Pacific: Peace,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New Delhi: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2018, p.11; Barbara Kratiuk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do-Pacific Stud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23, pp.279-280; J. Susanna Lobo, “Balancing China: Indo-US Indo-Pacific,” *Maritime Affairs*, Vol.17, Iss.1, July 2021, p.10.

[2] 参见 Rajesh Rajagopalan, “Evasive Balancing: India’s Unviable Indo-Pacific Strateg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6, Iss.1, January 2020, pp.79-80; J. Susanna Lobo, “Balancing China: Indo-US Relations and Convergence of Their Interests in the Indo-Pacific,” *Maritime Affairs*, Vol.17, Iss.1, July 2021, p.9 等。

而非仅仅作为一支平衡性力量。2023年9月,莫迪进一步强调,印度的外交政策已从“不结盟”转变为在全世界范围内缔结友谊,目标是扮演“世界之友”(Vishwamitra)的角色。^[1]无论是争当“领导型大国”,还是要当“世界之友”,都显示了莫迪政府渴望提升印度全球影响力的政治雄心。

印度强调要“由近及远地拓展自身影响力”,其周边地区则成为拓展影响力的重要区域。莫迪2018年的“香格里拉讲话”相对宽泛地界定了所谓“印太”的地理范畴,强调“印太”是指从美洲西海岸一直延伸至非洲东海岸的广阔海洋空间。^[2]在2021年9月举行的“印太海洋倡议”全国性磋商会议上,印度外交部时任东方事务秘书戴思锐(Riva Ganguly Das)运用印度传统的圈层理念对“印太”概念予以进一步阐释,她提出多重半圆或许是描述印度的“印太”地理范围的最佳方式,最内侧的半圆包括紧邻印度的直接邻国,这些南亚国家不仅与印度共享印度洋海域,而且还共享文明与文化遗产;印度及其直接邻国之外的半圆则涵盖了印度西面的海湾国家和印度东边的东南亚国家。^[3]这一观点就明确凸显出周边地区在印度的“印太”战略框架中的重要地位。

印度在参与所谓“印太”机制建设的过程中,主要通过强调“包容性”^[4]与“东盟中心地位”两大原则来凝聚地区共识,增强印度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一方面,印度着力宣讲“包容性”是其“印太”愿景的基石,是印度深度参与“印太”机制、开展“印太”海洋合作的价值观基础。

[1] Prime Minister's Office, Government of India, "English Rendering of PM's Address to Member of Parliaments in the Central Hall of Parliament," September 19, 2023, <https://www.pib.gov.in/PressReleaseDetailm.aspx?PRID=1958774®=3&lang=2>.

[2]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 June 1, 2018,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018>.

[3] 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 *Indo-Pacific Oceans Initiative (IPOI): Towards a Sustainable and Prosperous Indo-Pacific Region*, New Delhi: Sapru House, 2022, p.15.

[4] “包容性”源于印度教中的吠檀多哲学,主张“多元一体”。莫迪认为这种“包容性”理念构成了印度文明的精神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印度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方式。

莫迪宣称,印度对“印太”最主要的概念贡献就是提出了“包容性”,这种“包容性”既是印度特色的“印太”哲学观的具体体现,又是印度对“印太”的一项“承诺”。^[1]另一方面,印度在参与所谓“印太”机制建设过程中也表露出“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姿态。莫迪表示,东南亚处于“印太”的中心;在印度构建“印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进程中,“东盟中心地位”始终是印度的一大指导原则。^[2]在近些年美国对华竞争战略升级导致地区地缘政治局势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印度试图通过凸显“东盟中心地位”安抚东盟国家,打消它们对“印太”的疑虑,增加印度深度参与的相关“印太”机制对它们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印度强调要将东盟置于印度“印太”政策框架的核心,希望通过强化“东盟中心地位”来“帮助东盟壮大声势”,避免“印太”地区由单一大国主导,借此助推多极“印太”秩序的构建,为印度拓展地区影响力奠定基础。^[3]

(三) 深度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塑造对印度有利的地区经济格局

扩展经济利益是印度积极参与所谓“印太”机制建设的又一大动力。在印度看来,“印太”地区GDP总量占全球份额的65%以上,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约68%,全球1/3的贸易和能源运输都要经过这片海域。该地区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且各个次区域在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经济潜力巨大,这为印度参与所谓“印太”机制提供了“广阔空间”。随着印度经济持续增长,印度愈加依赖全球与地区经济一体化。与美国近年在“印太”地区高度关注军事安全不同,印度的“印太”愿景是经济与安全并重,因而将深度参与地区机制、强化自身经济存在视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塑造于己有利地缘经济格局的重要手段。

[1]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 June 1, 2018,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018>.

[2]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 June 1, 2018,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018>.

[3] Darshana M. Baruah, “India in the Indo-Pacific: New Delhi’s Theater of Opportunit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ne 30, 2020, p.12.

印度经济近年来表现“亮眼”的同时,也存在较大问题,如大规模制造业持续疲软,出口表现明显低于预期。更重要的是,印度仍游离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既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之外,在中、日、韩等东亚主要经济体深度融入的地区经济结构中逐渐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为扭转这种不利态势并深度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印度试图绕过原有区域经济合作框架,通过参与Quad、“印太经济框架”“印太海洋倡议”等地区机制深化与“印太”伙伴国的经济合作,塑造新的区域经济架构,为印度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在所谓“印太”经济架构中,印度自认为可凭借自身经济实力和有利地理位置发挥独特作用,并希冀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水平、提升地区连通性来降低交易成本,充分发掘“印太”地区的贸易潜力。与此同时,印度还将确保贸易畅通、获取西方技术与资本、打开西方市场、推动全球供应链多元化作为印度深度参与“印太”机制的重要经济目标。^[1]

上述经济思维在印度参与所谓“印太”机制建设进程中有着鲜明的体现。2017年印日共同推出的“亚非发展走廊”倡议的一大经济目标就是在亚非地区构建一个“高效、可持续、以人为中心”的洲际合作框架,进而推动亚非经济一体化。印度深度参与的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则将地区发展与经济繁荣作为一项重要目标,2022年3月发布的《BIMSTEC运输联通总体规划》旨在协调各种类型的联通框架,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印度积极参与美国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也是希望借助美国的主导地位吸引美西方国家投资,推动供应链多元化,深化印度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参与。

[1]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 June 1, 2018,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018>; Jitendra Uttam, “India’s Tryst with the Indo-Pacific,” in Barbara Kratiuk, Jeroen J. J. Van den Bosch, Aleksandra Jaskólska and Yoichiro Sato, eds., *Handbook of Indo-Pacific Stud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23, p.382.

印度主导的“印太海洋倡议”也有多项经济目标，它是印度关注海洋经济发展、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而打造以印度为核心的“印太”经济架构的初步尝试，具体可归结为四个冠冕堂皇的目标：一是改善“印太”地区海洋基础设施的联通性，通过强化伙伴关系以及推动地区数字贸易来建强海洋贸易联通与运输网络；二是创新海洋学术伙伴关系，加强海洋信息共享，大力发展渔业、可再生能源、沿海旅游等蓝色经济，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推动“印太”国家在海洋资源管理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尤其是加强关键矿产和重要稀土资源等方面的合作；四是确保对海洋贸易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的安全，确保海洋贸易的可持续性与安全性，提升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性及适应能力。^[1] 总体而言，印度试图依托“印太”机制推进以印度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重塑地区产业链与贸易链的同时优化本国产业结构，助推“印度制造”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

三、印度参与“印太”机制建设面临的制约因素

2018年莫迪“香格里拉讲话”后，印度对所谓“印太”机制的参与程度日益加深，参与范围逐步扩展，但其未来前景也将受多重因素的制约。

（一）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不确定性限制了印度参与所谓“印太”机制的政策选择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和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在导致全球资源分配与力量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也深刻改变着亚洲地区的力量对比态势。^[2] 其中，美国和中国是影响印度深度参与所谓“印太”机制的两个最重要外部因素。

[1] 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 *Indo-Pacific Oceans Initiative (IPOI): Towards a Sustainable and Prosperous Indo-Pacific Region*, New Delhi: Sapru House, 2022, pp.8-9; “Indo-Pacific Ocean Strategic Framework,” Maritime Fairtrade, December 1, 2025, <https://maritimefairtrade.org/indo-pacific-ocean-strategic-framework/>.

[2] Barbara Kratiuk et al., *Handbook of Indo-Pacific Stud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23, p.34.

首先,印度对“印太”机制的参与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尽管印度将美国视为“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高度关注美国在“印太”机制中的作用,但印度战略界一直有观点认为,美国参与“印太”事务的意愿实际是呈下降之势,其战略目标与战略行为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很难成为值得信赖的战略伙伴。一方面,美国实力下降导致其投入“印太”的资源减少,这会增加“印太”地区的不确定性。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印度陆军工程兵团退役中将亚什·马尔霍特拉(Yash Malhotra)等战略精英就指出,国际社会中有两条美国必须应对的“冲突线”,一条在俄罗斯与北约(欧盟)之间,另一条在中国与美国及其亚洲盟友之间。在美国国力下降、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印度必须认真思考美国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和政治意愿同时在欧洲和“印太”地区进行有效部署,以实现其战略目标。^[1]尽管美印关系特别是防务合作在第一届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时期有显著加强,但双方还是存在明显的政治互信不足与战略目标错位等问题。

另一方面,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奉行“美国优先”的政策框架下,美国的全球战略日益呈现出收缩和“甩包袱”的态势。美国不愿承担过多的国际义务和安全责任,转而对盟友和伙伴国在地区安全方面提出更多、更高要求,美国对外政策的摇摆性、不可预测性及单边主义特征显著增强。2025年发布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美国的对外战略将从全球主义转向国家主义;美国不再一味地追求全球主导地位和承担过多的全球责任,而是要以自身国家利益为基础,巩固本土经济安全与边境安全,强化美国在西半球地区的主导地位。^[2]事实上,特朗普再度上台以来迟迟未再提“印太战略”字眼,甚至将其第一任期改名的印太司令部又改回原来的名字——太平洋司令部,其前任力推的“印太经济框架”等机制也基

[1] Yash Malhotra, "The 'Indo-Pacific' with Indian Characteristics," 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 July 10, 2018, p.7, <https://maritimeindia.org/the-indo-pacific-with-indian-characteristics/>.

[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pp.1-5.

本处于搁置状态。这种变化使印度难以把握美国在“印太”的政策走向。更重要的是，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大大压缩了印度外交的战略空间，而且美印关系也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出现一定裂痕，美印之间的关税摩擦以及印度执意购买俄罗斯石油等问题加深了特朗普对印度的不满。在这种氛围下，印度既不确定自身在“印太”地区需要承担多大“责任”，又担心美国从“印太”事务中抽身，转而与中国改善关系。2026年5月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印度对中美关系缓和感到忧虑，认为美国在“印太”地区战略行为的这种不确定性会削弱印度战略主动权，进而损害印度的战略利益。^[1]

其次，印度认为中印之间日益加剧的“权力不平衡”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印度在“印太”地区的行为，“中印权力关系的巨大不对称性对印度而言是一种‘不可抗力’因素”。^[2]印度自视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性大国”，但其实力相对于中国却在急剧下降，这种不对称性体现在经济、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印度的整体经济规模比中国要小得多，两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巨大，并且还在进一步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等估算，印度与中国在经济总量上的差距将从2020年的12万亿美元扩大至2030年的19万亿美元。^[3]这种经济实力差异在中印经济关系中有着鲜明体现。2025—

[1] 参见 Mugdha Satpute, “Outcomes of the Trump–Xi Summit and India’s Strategic Concerns,” *The Times of India*, June 5, 2026,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logs/voices/outcomes-of-the-trump-xi-summit-and-indias-strategic-concerns/>; Tanvi Madan,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earing on India, Chin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Indo–Pacific*,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February 17, 2026,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6-02/Tanvi_Madan_Testimony.pdf.

[2] Rajesh Rajagopalan, “Evasive Balancing: India’s Unviable Indo–Pacific Strateg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6, Iss.1, January 2020, p.78; Arshid Iqbal Dar, “India’s Indo–Pacific Policy: Unpacking the Underpinnings and Challenge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 Iss.4, December 2023, p.604.

[3] 参见世界银行集团：“世界发展指标：国家和经济体”，<https://data.worldbank.org.cn/>；Arshid Iqbal Dar, “India’s Indo–Pacific Policy: Unpacking the Underpinnings and Challenge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 Iss.4, December 2023, pp.604–605。

2026 财年中国再度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 1511 亿美元，印度对华贸易逆差扩大至 1121 亿美元。^[1]在当前印度遭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自身制造业发展受阻且核心产业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的背景下，印度很难单方面推动“去中国化”，依托所谓“印太”机制重塑自身经济结构。因此，印度既需要充分考虑自身经济需求，也不能无视中国核心关切，以免因过度对抗引发中国反制。印度认为，在中国尚未接受“印太”概念而且反对以 Quad 为主的“印太”机制的大背景下，中印之间的“实力差距”使得印度对进一步参与美西方主导的“印太”机制持有谨慎态度。印度担心，深度参与“印太”机制、与美西方深度绑定，有可能引发中国强烈不满，反而会使印度面临巨大的政治和战略压力。

（二）印度“战略自主”传统的局限性对地区机制制度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构成制约

当前印度对地区机制的参与程度已经较深，印度只有顺势加强与机制主导方之间的政策协调，才能进一步增强地区机制的运作效能。但反过来看，地区机制制度化水平的提升将削弱印度外交的自主性，从而与印度外交传统中的“战略自主”原则产生矛盾。地区机制要想强化其有效性与合法性，主导国家就必须加强所谓规则约束力、增强大国集体行动的有效性、确保机制的权威性与集中性等^[2]，并加大对机制的调整与改革力度。这意味着这些机制会朝着集中资源、统一协调和共同行动的方向发展。印度则希望确保地区机制的多元性、开放性与包容性，维持相关机制的松散性与非正式性的特征；认为将地区机制打造成一个稳定、封闭、集中的组织管理架构会损害其“战略自主”，大幅压缩其战略腾挪空间，进而损害其核心利益。

“战略自主”既是印度外交的一项基本原则，又是印度参与地区机制的基础。印度希望通过坚持“战略自主”原则形成一种多元化外交政策，在“印

[1] 《中国成为印度 2025—26 财年最大贸易伙伴》，商务部网站，2026 年 4 月 22 日，http://in.mofcom.gov.cn/jmxw/art/2026/art_d962ed18a852496fa4076d454497fe5a.html。

[2] 郑先武：《大国协调与国际安全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5 期，第 60—63 页。

太”地区拓展外交政策空间，以便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时不受单一强国或国家集团的掣肘。^[1]因此，印度强调既要深化与西方及东盟国家的关系，又要把握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照顾俄罗斯、伊朗等被美国视为“对手”的国家的利益关切，维持中印关系总体稳定，都是印度“战略自主”原则的具体体现。一方面，即使在加勒万河谷冲突后中印关系出现波折的背景下，为继续维系所谓“战略自主”原则，印度并未积极寻求依托 Quad 等相关“印太”机制来挑衅或对抗中国，而是刻意弱化 Quad 的军事属性，试图让该机制的主要安全议题聚焦于非传统安全领域，不支持在 Quad 框架下开展更正式的军事安全合作。^[2]正如牛津大学学者所指出的，如果从军事层面加以评估就会发现，印度的现行政策选择实际上并不利于 Quad 发挥其总体军事效能。^[3]

另一方面，印度将俄罗斯视为确保自身“战略自主”的重要一环，认为印度不仅需要美国主导的“印太”机制来制衡中国，还需要强化印俄关系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印度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日益加强视为“对印度战略利益的重大挑战”，希冀通过强化印俄关系来平衡中俄关系，加之印俄间的传统纽带特别是在军事装备技术、能源等领域对俄依赖等因素，使得印度与 Quad 其他三国在对俄政策上存在明显分歧。2022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印度并未与美日澳三国形成一致的反俄立场，未与三国一起没有公开指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是采取一种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印度这种中立态度一度引发美日澳的不满，甚至出现一种要求“惩罚印度亲俄行为”的声音。总之，印度

[1] Nidhi Prasad, “India’s Foray into the Indo-Pacific: Embracing Ambiguity through Strategic Autonomy,” 堀本武功、三輪博樹編：『モディ政権とこれからのインド』調査研究報告書，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アジア経済研究所，2019 年 3 月，p.141.

[2] 为照顾 Quad 成员国各自不同的利益关切，强化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Quad 强调要维持现有结构，确保 Quad 本身的灵活性和非正式性。就现阶段合作程度而言，Quad 框架下多数安全合作的军事色彩和对抗性色彩较弱，Quad 尚未发展成一个安全同盟。参见 Arzan Tarapore, “Zone Balancing: India and the Quad’s New Strategic Logic,”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9, Iss.1, January 2023, p.251; Ash Rossiter, Brendon J. Cannon, “Quad in the Indo-Pacific: Role of Informality in Countering China,” *Issue Brief*, Institute for Security & Development Policy, February 7, 2023, p.4.

[3] Kate Sullivan de Estrada, “India and Order Transition in the Indo-Pacific: Resisting the Quad as a ‘Security Community,’” *The Pacific Review*, Vol.36, No.2, January 2023, p.395.

对所谓“战略自主”原则的追求以及由此引发的多重利益考量，意味着其倾向于谨慎对待推动相关地区机制向着集中化、统一化的趋势发展。

事实上，地区机制对于相对集中和统一性的要求与印度“战略自主”原则导致的相对松散性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这是印度参与地区机制建设时面临的一个制度性难题。即使是印度占据主导地位且参与程度最深的“印太海洋倡议”也面临类似问题。印度强调“印太海洋倡议”是一个开放、自愿、非基于条约的地区海洋合作框架。然而，印度在机制设计过程中对分散性的强调使得“倡议”缺乏长期性的组织架构以协调利益攸关方的行动，并且“倡议”框架下的各大支柱缺乏明确的、实质性的多边合作方向或议程。非条约性及自愿原则意味着机制约束力有限，这种松散性使得印度很难通过“倡议”凝聚各方共识、协调参与国之间不同的战略优先事项与政策框架，从而难以统一伙伴国的行动并建立起各方都可接受的标准。这种分散性与松散性问题不仅对地区机制的实际合作效能构成制约，更是成为阻碍相关地区机制制度化建设进程的一大掣肘。

（三）国家实力的有限性制约印度对地区机制的均衡参与

印度参与地区机制建设有着安全、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战略诉求。印度期望借此在安全上深化与伙伴国的战略合作，在应对“中国挑战”的同时塑造有利的周边海洋安全环境；在政治上提升印度影响力，进而维护印度的大国地位；在经济上深度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加强与东南亚及美西方国家的经济融通。战略目标的多重性要求印度运用多样化的手段推动具体政策的实施，但印度国家实力和资源相对有限，很难进一步推动这些机制的发展以实现上述宏大战略目标。例如，在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中，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聚焦政治与安全议题的机制无需大量资金与资源投入，印度得以快速推进多边安全对话、海上联合演习等相关合作议程。然而，对于需要大量资金与资源投入的经济机制，印度推动相关合作议程则要缓慢得多。印度—东盟经济合作框架下诸如印缅泰三边公路等一些旗舰项目进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2024年2月，印度以“国内

安全关切”为由废除了印缅自由通行制度，这使得印度与东盟的跨境联通项目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1]对于2012年在湄公河—恒河合作机制框架下设立的“快速见效项目”(QIP)^[2]，印度的支持力度与资金投入也极为有限。“快速见效项目”设有专门的循环基金，印度承诺每年为其提供100万美元；尽管近些年基金规模逐渐扩大，但是2020年后印度每年也仅提供200万美元。^[3]这种有限的资金支持对于耗资巨大的地区基础设施联通项目而言远远不够。印度为加大在“印太”的经济参与而在2018年启动的印度—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同样进展缓慢。经过多轮磋商，双方在市场准入、关税等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资源有限且相关合作进展缓慢，凸显了印度参与相关地区机制的不均衡性。印度学者认为，仅仅依靠战略对话无法改善印度与东盟之间的经济现状。印度必须强化经济方面的参与，这对于推动印度—东盟经济一体化进而构建相对均衡的“印太”地区框架至关重要。^[4]

印度深度参与的“亚非发展走廊”倡议也面临类似局面。尽管早在2017年5月，印日就发布《亚非发展走廊愿景文件》，阐述两国合作的优先领域^[5]，但该倡议高开低走，实际项目进展缓慢：两国间的许多项目在操作层面没有实质性进展；多个宣布启动的项目仍处于探索阶段，可实际交付

[1] Shantanu Roy-Chaudhury, “From ‘Look East’ to ‘Act East’: Mapping India’s Southeast Asian Engagement,” *ORF Issue Brief*, No.800, May 2025, pp.11–12.

[2] “快速见效项目”聚焦于建设低成本(每个项目成本不超过5万美元)、短期见效(项目正常成长周期最长一年)、高可见度并且能够在基层社区产生积极影响的短期项目。“快速见效项目”主要涉及实体基础设施(道路、基层社区中心)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如教育、医疗健康、社区发展)的创建或升级。

[3] Mekong Ganga Cooperation, “Quick Impact Projects,” <https://mgc.gov.in/qip>; Mekong Ganga Cooperation, *Plan of Action to Implement Mekong Ganga Cooperation (2016–2018)*, 2016, https://mgc.gov.in/public/uploads/MGC_POA-2016-18.pdf.

[4] Arshid Iqbal Dar, “India’s Indo-Pacific Policy: Unpacking the Underpinnings and Challenge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 Iss.4, December 2023, p.613.

[5] RIS, ERIA and IDE-JETRO, *Asia Africa Growth Corridor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 Vision Document*, Ahmedabad: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Meeting, May 22–26, 2017, pp.8–9.

的成果极为有限。除印日之间缺乏相关合作经验以及两国官僚系统僵化之外，亚非发展走廊经济合作项目巨大的资金需求也是项目推进与机制发展的一大障碍。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一项，非洲每年至少需投入 1300 亿美元。^[1]这对于印度与日本及非洲开展的多边合作可谓是重大挑战。可见，印度在地区机制框架下的资金支持功能和效果相对有限，难以做到如其宣传的“帮助”改善或提升“印太”伙伴国的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建造能力，这成为掣肘印度深度且广泛地参与相关地区机制建设的深层次因素。

另外，当前印度经济仍面临制造业发展动力不足、进出口贸易结构失衡、外国直接投资显著下降、货币大幅贬值以及营商和就业环境相对较差等问题。例如，2026 年 5 月 20 日卢比对美元汇率一度触及历史最低点；美以伊冲突对波斯湾地区油气供应造成的严重冲击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高温天气等问题使得印度的能源短板更加凸显，等等。这些因素相叠加不仅加剧了印度的财政压力和经济负担，更进一步削弱了印度在参与所谓“印太”机制建设中的资金资源投入和战略自主能力。

结 语

在印度参与相关地区机制建设的进程中，所谓“中国因素”一直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一方面，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杞人忧天”式的担忧，印度有着积极参与所谓“印太”机制的意愿，希望以此来维护自身的安全、政治及经济利益，并在塑造多极“印太”格局的同时，平衡中国迅速增长的地区影响力。另一方面，印度对中印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有着“清醒的认识”。这种对华认知与印度的外交传统——“战略自主”相结合，促使印度以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来处理对华关系。印度希望能够维持中印关系的

[1] Anita Prakash, “Free, Open and Inclusive Indo-Pacific: An Evolving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 for Asia Africa Growth Corridor,” in Sachin Chaturvedi, Anita Prakash and Priyadarshi Dash, eds., *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Indo-Pacific*,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 2020, p.37.

基本稳定，确保印度与全球主要大国关系的总体平衡，以最大限度地拓展印度的战略空间。在这种思路下，印度对更进一步地参与美西方国家主导的“印太”机制心存疑虑，不太支持将这些机制发展成军事色彩浓厚的反华联盟，特别是不希望被直接卷入美中之间的对抗甚至冲突。

对于中国而言，需要高度关注印度深度参与相关地区机制建设有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坚决反对零和博弈，反对地区相关机制建设中的排他性做法，坚定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与此同时，中印互为重要邻国，同属全球南方，两国互信合作有利于共同发展，分裂对抗无助于亚洲振兴。^[1]中国需要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中印关系，通过积极沟通、增进互信、拓展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等方式推动中印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并积极加强两国在全球南方的合作，壮大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力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收稿日期 2025-11-15】

【修回日期 2026-06-21】

（责任编辑：一响）

[1] 《王毅：中印互信合作有利于共同发展，分裂对抗无助于亚洲振兴》，外交部网站，2026年3月8日，https://www.fmprc.gov.cn/wjbzhd/202603/t20260308_11870517.shtml。